

文化之重何在？

艺术与文学对我生命的影响决定了我的认知，然而这并非我论述的重点。可以说，它们帮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的职业是为艺术与文学服务，并致力于传播它们。于我而言，它们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乐趣所在。在我孤独时，文学、哲学、电影、艺术和音乐陪伴着我，助我面对痛苦也同我分享喜悦。它们放大了我的情感与欲望，有时能帮我厘清思绪，有时则让我心绪万千。它们给予我爱的灵感，为我创造场景，有时甚至为我递上剧本。诚然，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因而我也无需在书中赘述，何况早已有更权威的学者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在《濒危的文学》中所说的：“要问我为何热爱文学，我脑海中自然而然浮现的答案是：因为文学帮助我活着”。对此我深以为然，托多罗夫定义了一种理解文学与生活的特定方式，但这并不为所有人认同。

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好似生活的灵药。它们能帮助我们生活，同时又兼具精神类药物的功效：唤醒、强化人的感知，让人自我麻痹，从而改变人的认知抑或是予人以启示。既然现在贩卖这种物质并不违法，那我便以此为业，试图让我的学生和孩子们也同我一样对文艺上瘾。不过这篇文章谈及的更多是集体层面的文化而非个人体验，因为我想谈论的文化不局限于文学与艺术等文化形式，而是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文化，包括自认为与文化毫不相干的人都浸润其中的文化。我要谈的是文化的社会意义。

认为文化面临威胁的观点实则源于两种错误认知。其一是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或奢侈品，只能对生活的主要方面起到充实和装点的作用，而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则是众所周知的健康、爱，尤其是财富。这种观点可谓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威胁，因为它只在意肉眼可见的效益。但这一观点其实也源于某种民粹主义，因为它将文化划归为精英阶层的利益。其二则是认为文化正在贬值和消失。持这一观点的人属于所谓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将文化与他们敝帚自珍的精英文化混为一谈，并以一种怀旧的矫情预言着文化凋敝的趋势。然而从职业上来说我也被划归为知识分子精英这一少数群体，这让我立刻在关于文化的辩论中难逃指摘。西班牙皇家学院词典对“精英主义”一词的定义为“倾向不同于大众的品味和喜好”，因此我并不奢求为自己身上的“精英主义”开脱。但是要从“精英”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文化的价值毫无意义，况且我也不想被剥夺为大众利益说话的权利。想要化解上述两种错误观点，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来探讨文化的意义：如何为文化正名才能既免于戴上精英主义的帽子，又避免流于怀旧而泛泛空谈？

由于我从事理论研究，所以本书中我的论证也将基于理论反思并对历来文化研究大家的重要理论贡献进行回顾。我知道这无益于摘掉我身上“精英主义”的标签，但是为什么科

学家不会因其专业化、理论化的表述而被打上这一标签呢？我会尽可能地表述清楚，毕竟把本就困难的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将毫无益处。但是我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区分理解上的困难和意识形态的藩篱。解释文化的实质、运作方式和作用本就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且途中鲜有同伴，亦无捷径。关于文化的定义和运作模式众说纷纭，分门别户。因此人们在选择相信某种理论和认同某种方法的时候已然选边站队。同时，意识形态上的站位也决定了人们是否相信文化濒危的警告和悲戚唱和文化的挽歌。

基于以上种种我选择不从人文学科及其危机的角度来谈文化。因为人文学科只是一个特定的关于知识、研究和学科的分类，其目的在于产出某些特定的人类文化形式。比如，哲学、历史、文学、视觉艺术与音乐，但这些形式其实并不能覆盖最广义的文化。我们的确可以说文化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是人文学科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任何人文学科都只不过是某种文化活动。我们必须先将人文学科和文化区别开来，才能讨论因在某种程度上混淆这两者所带来的问题。

我知道，本文会因未具体论及文化和科学以及文化和教育的关系而招致批评。我想在此澄清，不论是在撰写序言还是书中其他章节时，科学于我即是文化。我认为将两者区别开来谈其中关系并无意义。珀西·斯诺早已论证过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区别以及拉近两者关系的必要性。但如同我在上文所说，我所指的文化绝不限于人文文化。再者，我并非科学家，就不在我不熟悉的领域造次了。不过说到教育，这倒是我的研究领域。正因此我必须得选择是著书立论来谈文化还是蜻蜓点水般略过。于我而言，教育和文化联系紧密、不容分割，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中再次谈到。我不赞成将两者作为不同行政管理内容分开进行管理，好似它们一主一次，又好似它们只是对人生的不同阶段产生影响。我认为我接受的教育还远未结束，我希望在退休后继续接受教育。我也不知如何把教育和伴我成长的其他文化活动加以区别。奈何人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教育是教授有用的知识，而文化则是传递无用的学问。

我大致认同奥尔迪内在《无用的宣言》中关于非功利性知识的论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正是由于“无用”的非功利性知识并不服务于某种具体需求，因而具有普适性。今天人们往往以通过教育获得的就业竞争力来衡量教育效益，我们只有跳脱功利性知识的思维局限才能打开新的文化批评空间去想象另一个世界。其实这种不屈服于实用主义的逆流反思能力并不局限于人文学科领域，不论是在科学界、漫画界还是说唱文化等众多文化形式中都有所体现。我们要知道，当奥尔迪内引用巴塔耶谈及“多余和非必要”以及“浪费生命”的事物的意义时，他也意指奢侈品、狂欢节和宗教仪式背后的文化性质。如今人类社会对稀缺资源精打细算，倡导节俭，但巴塔耶指出人类本身以及大自然本身的特质就是“多余”。人

类及其创造于大自然而言本就是一种多余和过剩，甚至让大自然付出了高昂的灾难性代价。

关于人文知识之重的思考与文化价值的争论密不可分，但要论证文化的价值还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要超越将文化等级化的先验主义，整体性地去审视社会的运转，看到并认可那些同属文化维度但非属主流的文化活动。与其哀叹失去了那个也许曾只为少数人拥有过的天堂，我们应该在最广义的维度上确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挽救人文学科的价值。只有超越文化的雅俗之争，让文化的无形维度凸显，我们才有可能避免“鱼不知水”的危险境地。即使文化的概念处于危机之中，但文化本身并无虞。文化可能看似无用，可能无人在意，但绝不会处于危机之中，因为文化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框架。